



## 公共性——儒家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关键

(2005-6-29 10:36:21)

作者：方尔加

第四，公共性不能脱离最普遍的生活。公共性的道德就寓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非高踞生活之上。“中庸”被中西双方都奉为高级的道德准则。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一些“中庸”：“关于荣誉和耻辱，其适度是适当的自豪，其过度，可以叫做虚荣，不及则可叫做卑贱。”（《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299页）“关于信实，……对于中道的遵守叫信实，过度的虚伪可以叫做虚夸，……过度谦虚叫做讥讽……。”（《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300页）“关于恐惧和自持的情感，它的中道是勇敢……至于过于自持，则是鲁莽；过于恐惧而太不自信，则是怯懦。”“关于某些快乐和痛苦（不指一切苦乐皆如此，特别是苦痛）的适度是节制，过度则是放荡，不及则为不愿行乐。”“关于金钱的取与舍的适度是乐施，过度与不及是挥霍与吝啬。”“关于怒，……我们就姑以和蔼名其适度。……那些过度的人为暴烈的人，……至于不及的例，即无怒气的人，我们可称之为优柔。”（《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296页——300页）孔子列举的“中庸”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是在过分“进取”与“不为”之间取适度。此外还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是讲“乐”“哀”情感发之须适度，不走极端。类似的说法还有“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但是，两者“中庸”有很大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局限于道德，还涉及许多生活中事。如：“情感、情绪、感受、娱乐、交往、饮食、运动、技艺、消费、算术，等等等等他都曾谈到。不仅亚里士多德，连神秘主义十分浓厚的毕达哥拉斯也在生活中谈“中庸”。他说：“在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不要忽略你的身体的健康；饮，食，动作，须有节。——我所说的有节，即不引来苦难之程度。”（《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6页、18页）儒家的“中庸”不但种类单调，缺乏生活气息。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矣”，顶尖之德也，对民来说岂能不神！（雍也）《中庸》一书一开始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性”、“道”都是至今都难于辩清的玄奥词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84、86页）喜怒哀乐发与未发、中节与否并不神秘，但把他们推致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推崇其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只有个别修养到极高境界的道德文化精英能够领会，对普通人则是一头雾水。亚里士多德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人感到“中庸”随事可求。而儒家的“中庸”，只有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才能达到。《中庸》一文对“中庸”的虚玄描绘也足证其与日常生活隔阂之悬。这一状况直至宋明理学产生时仍无改进。周敦颐《太极图说》讲到“中”：“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立人极焉。”（《儒学经典·周子全书》第1491页。《中华经典藏书》史仲文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中”是超脱出老百姓生活的象牙塔境界，即所谓“人极”。与百姓生活不相关的道德只能被敬而远之，百姓怎能自觉遵守！

以上中国先秦与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比较具体地凸现了儒家公共性的如何缺乏，以及对今日社会的消极影响。笔者无意否定儒家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儒家个人服从整体、追求君子境界重义轻利、处世平和、讲求慎独、自强不息等美德为中华民族几千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提供了精神上的保障。儒家的消极面只是在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到来时才开始日益显现。到了现代化社会，家族被打破，公民社会出现，急切需要用公共意识取代家族意识，儒家道德的落后性遂突出出来。但是，儒家没有死亡，他会象魏晋、宋明时期那样与时俱进，随着公共性观念的溶入而得到新生。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